



文化视野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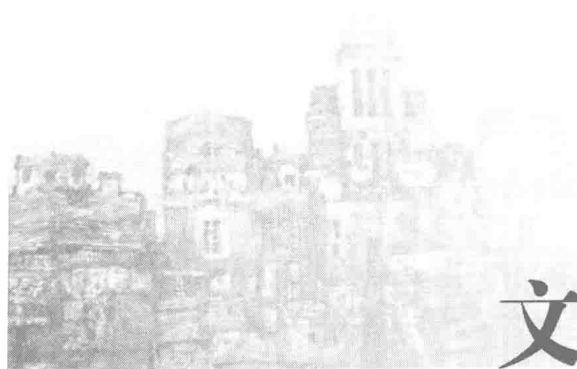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民居

WenHua ShiYe XiaDe
Jindai ZhongGuo MinJu

黄锡平 夏忠祥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文化视野下的 近代中国民居

WenHua ShiYe XiaDe

Jindai ZhongGuo MinJu

黄锡平 夏忠祥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民居/黄锡平,夏忠祥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216-08657-8

I.文… II.①黄… ②夏… III.民居—建筑艺术—中国—近代

IV.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9236号

出品人:姚德海

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分社

选题策划:陈令军 叶宝福

责任编辑:尉侯凯

封面设计:汪 汉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杜义平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字数:436千字

书号:ISBN 978-7-216-08657-8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23.75

印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插页:3

定价:88.00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 <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 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 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序言

文化与建筑的对话：记忆不存，乡愁何寄

我们始终在与文化相遇，或者说始终生活在文化之中。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0种之多，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认为，有两个说法值得在此提出并加以思考：一个是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aylor）的说法：“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另一个说法出自国学大师梁启超，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前者强调的是文化的基本范畴与内涵，后者更注重文化的心理动因与普世价值。从范畴上说，建筑艺术是文化这个复杂体系的一个分支。从心理动因上说，建筑艺术所展现的正是人类丰富多彩的心路历程。

与建筑对话也就是与文化对话，这句话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建筑既自成一体亦包含着整体，建筑艺术史既内在于文化史中亦透露出文化史的整体精神，部分与整体相互包含；第二，可以从建筑中发现文化精神的奥秘以及文化存在的方式，或者说可以从建筑中读出文化哲学。建筑作为凝固的音乐，无声的史书，深刻反映了人类文明史的演进过程。从埃及到希腊，从中国到玛雅，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见到那些古老的建筑遗迹，这是幸运的，数千年以来的建筑艺术史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生动写照。古典主义、罗马风、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折中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每一种建筑思潮和流派都是特定时代的人文精神的典型体现，人类内心世界的万变与守恒在建筑艺术中有着极为生动的演变方式，一如宇宙星空的浩瀚、深邃与完美。人是建筑的缘起，也是建筑的目的，我们每个人也都生活在建筑之中，因此，与建筑的对话同样也就是与人的对话。

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往往是先从建筑获得对某一城市的个性印象的。试想，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名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抑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哪一个不是建筑艺术的荟萃之地，而经典建筑也往往成为城市的象征，比如故宫之于北京、大雁塔之于西安、唐昭提寺之于奈良、雅典卫城之于雅典、斗兽场之于罗马、花之圣母大教堂之于佛罗伦萨、圣母院之于巴黎、科隆大教堂之于科隆、大英博物馆之于伦敦、克里姆林宫之于莫斯科、歌剧院之

于悉尼、天主教堂之于圣保罗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建筑，形象地勾画出了所在城市的历史特质和人文底蕴，建筑为城市之魂，我想，这样说并不过分。

城市的魅力来自于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创新，神州大地，泱泱中华，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地域的改变、文明的进步，中国古建筑的韵律、形态、功能也随之呈现出丰富的变化。从南方的干阑式建筑，到西北的窑洞建筑，以及北方的四合院建筑等，灿烂的文化创造出数不胜数的宫殿、陵墓、庙宇、亭台、民宅……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及西方文化的侵略，许多生机勃勃又极富地方特色的街区被重复堆砌的钢筋水泥和千篇一律的花坛草坪替代，如今我们的城市正越来越丧失个性。梁思成、林徽因等名人故居被推土机推倒、5000年历史的大连郭家村遗址遭破坏性开发、近千年的安徽释迦古寺旧址上如今建起一排排商品房，城镇化的进程和推土机的力量，撕裂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留存记忆。多少城市迷失在无休止的膨胀和浮肿中，多少拥有辉煌文明和文化特色的城市，几乎每天都在演绎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建设与破坏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于是，“一边拆掉真文物、一边再造假故居”的闹剧不断上演，大量不是文物的民居等，“墙橼灰飞烟灭”、消失于无声的岁月。剩下的是千城一面，楼盘林立，水泥森林。有人说，如果王勃再登滕王阁举目远眺，看到的怕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而是“楼盘与水泥齐飞，玻璃共强光一色”。急功近利的开发工程日复一日，被遗忘的历史文化让人痛心疾首。

乡愁，并非不能生长于现代城市。现代人的都市焦虑，恰恰需要传之久远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认同来抚慰。千百年来，文明的足音铿锵有力，时代的钟声不绝于耳，但无尽的乡愁作为城市建设之魂，已深深镶嵌在沉睡千年的秦砖汉瓦中，镌刻在精美绝伦的雕梁画栋中，植根于平民百姓的历史记忆中。正因为如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设要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文化的转型与整合时期，我们尤其需要用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从而实现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对此有一系列专门的论述，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来概括其“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学说的基本内涵，所谓“各美其美”指的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珍视，强调了文化传统上的自尊与自信；而“美人之美”则表示要对其他民族文化有一种尊重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善于欣赏和接受异质文化的长处，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至于“美美与共”则呈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学习与

相互吸纳的状态；处理好上述诸层面的文化关系，则可引导出人类各种文明的和谐互补的局面，也就有了实现“天下大同”的可能性。显然，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倡导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和东西方文化的激荡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留住乡愁离不开文化载体，也需要生长空间。它要的也不多，也许只是一棵老树，一块石库门建筑的构件，一座祠堂，一个湖泊而已。而最需要的，是人们的呵护之心，帮助抵挡各种觊觎的目光。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时代的标杆，今天的我们，在机械地模仿西方建筑、寻求国外设计机构在我们的土地上搭起一座座水泥森林的同时，是否有想过这个时代能留给未来一些什么？作家冯骥才说：“城市，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会尊敬它、保护它、珍惜它；你若把它只视为一种物质，就会无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诚哉斯言！记忆且不存，乡愁复何寄？

黄锡平



目录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民居

序 言 文化与建筑的对话：记忆不存，乡愁何寄 / 001

第一章 人文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 00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三个层面 / 001

第二节 从外使觐见礼仪之争看“中国中心论”传统观念的渐次嬗变 / 004

第三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早期器物层面的文化嬗变 / 007

第四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期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 / 011

第五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后期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 / 014

第二章 构筑舞台——中国近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 / 021

第一节 商埠城市中租界区的形成与拓展 / 022

第二节 中国近代主流城市——上海、武汉与天津的发展 / 037

第三节 北京与南京——都城的更迭与兴衰 / 075

第三章 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的克隆、传播与变异 / 088

第一节 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 / 089

第二节 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1900—1937）西方复古主义、折中主义建筑的克隆与传播 / 107

第四章 新旧交错的民国居筑文化 / 132

第一节 急剧变革的居筑礼尚与规仪 / 133

第二节 居筑样式的多元化发展 / 139

第三节 居筑观念更新与民居建筑演进 / 146

第五章 府宅居筑的变化 / 159

第一节 王府没落与居筑功能演变 / 159

第二节 官宅变迁与时尚化居仪 / 164

第三节 名人府宅的逐渐形成 / 171

第六章 都市民居的繁荣与发展 / 182

第一节 里弄居筑与市居民习 / 182

第二节 公寓与公馆的新式居尚 / 187

第三节 棚户、“贱民”与贫民窟的居俗 / 193

第七章 南北民居的传统特色与时代创新 / 197

第一节 乡土民居的保持与新风时尚 / 197

第二节 乡镇民居的时代变迁 / 204

第八章 园居的转型与功能衍化 / 206

第一节 村落园居与地域化特色 / 206

第二节 都市宅园的尾声与功能转变 / 218

第三节 大城北京的人文记忆：名人故居 / 222

第九章 洋居风尚的流行与居筑文化的中西交融 / 245

第一节 租界建筑与居筑生活 / 245

第二节 都市洋房、洋楼与西式居习 / 251

第三节 东南地区洋式民居与华侨居筑文化 / 265

第十章 作为建筑历史遗产的资源价值 / 268

第一节 历史遗产的资源特征 / 268

第二节 历史遗产的价值构成 / 273

第三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衍生价值的意义 / 283

第四节 留住“根”与“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 289

第十一章 人居文化——当代中国人居科学发展的历史抉择 / 315

第一节 文化——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抉择 / 315

第二节 当代中国城市问题的文化透析 / 319

第三节 让城市赞美生命——为人居立大典 / 323

参考书目 / 366

后 记 人生况味是奋斗 / 370

第一章 人文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三个层面

人类的文明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农业社会与近代工业社会，其发展进程中关键性的转变是由传统农业社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人类文明史的近代化进程始于西欧，然后扩展到北美与欧洲其他地区，然后再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其他地区。早期西方国家如英、美、法等国的近代化进程属原生形态的近代化进程，是内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演进过程，经由社会内部的创新而形成，采取渐进的演进方式，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点滴积累才完成这一进程。而后期许多国家如德、俄、日等国的近代化进程则属诱发型的近代化进程，是在与已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接触后，借取、效法其经验而发展实施近代化进程者，这是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相对于前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近代化进程。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也属于后一种类型。

中国近代史时期（1840—1949）是两种社会形态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古老的中华帝国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痛历“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王韬语），在因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被动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化进程中，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在中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和碰撞中解体与重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旋律，也同样构成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主旋律。

文化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只要是超越人类本能而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简言之，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如果把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体系细加剖析，可以将其分解为三个层面：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其外层是器物层面，即经过改造了的自然存在物；中层是制度层面，包括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规范化了的经济、政治、教育等各种体制、制度及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等；内层是精神层面，即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价

值观念、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审美情趣、民族素质等。文化的三个层面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文化嬗变的过程中，表层即器物层面的文化嬗变较易，中层即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较难，最难的是内层即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首先发生碰撞，进而相互交融，促成文化重构时，文化嬗变总是首先在器物层面，然后在制度层面展开，最后才触及深层的精神层面。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进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种冲击产生的影响：“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非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外国对中国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 1840—1842 年鸦片战争以后不到十五年，就有 1857—1860 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又过了十年左右，发生 1871 年俄国侵占伊犁和 1874 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爆发了 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九年以后，日本在 1894—1895 年甲午海战大败中国，紧接着是 1898 年争夺租借地和 1900 年的义和团之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灾难而来的，是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的破灭；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中西文化冲突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就是中华帝国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即传统的“中国中心论”观念的转变。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化进程中，也正是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三个层面的渐次的文化嬗变。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论》一文中这样论述这种嬗变：“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便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遭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新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

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了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中国近代史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从本质上讲，是时代性的文化冲突，即不同时代的文化——中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时代性的文化冲突导致文化整合，使渊源不同、性质不同、目标取向不同的异质文化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史就是这样一部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的历史，这种冲突与整合在 110 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三个层面的文化嬗变。鸦片战争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引起“道”“器”“体”“用”之争，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折中思想，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目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具体实施则是自 1860 年至 1895 年为期 35 年的洋务运动，这是文化表层——器物层面的文化嬗变，在维护封建社会体制的目标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吸纳西方近代文化的器物特征。1895 年甲午战役后，文化论争转入制度层面，中国的思想先行者已经认识到应当用“变法”乃至“革命”的手段来改变国家体制与社会制度，这是文化中层——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其结果导致 1898 年的戊戌变法与 1911 年的辛亥革命。辛亥之后，自 1915 年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论争，从而引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反省，这场史称“新文化运动”的论争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化史已经步入内层文化嬗变的阶段，导致精神层面的文化变革。精神层面是文化的灵魂，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关键在于精神层面的特征，从这场没有结论的“新文化运动”的论争开始，这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导向之争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文化转型期的这三个文化层面上的渐次嬗变并非截然分开，互不相干，而是相互影响交错进行的，这一文化嬗变的进程，从表象上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步步后撤，承认中国的器物不如西方，承认中国的制度不如西方，最后承认中国的思想不如西方。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象，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使“中国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彻底破灭，思想禁区渐次开放，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从外而内，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终于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迈开了向中华文化重构的长远目标前进的步伐。这种重构实际上是一种再生，时代进步，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当然不能永远停留在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郭沫若有诗题为“凤凰涅槃”，诗前有一段小注云：“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这鸟就是中国的凤凰，所以诗名“凤凰涅槃”。近代中华文化的重构正是这种“凤凰涅槃”式的文

化再生。

第二节 从外使觐见礼仪之争看“中国中心论” 传统观念的渐次嬗变

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这样评论中日两国引进、吸取、消化外国文化的心态：“首先必须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有着大量引进外国文化的传统，并在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首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世界文明（其意义包含着不是地区性的、‘具有世界规模的文化’的意思）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拥有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有着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加藤周一在《杂种文化》中指出，日本与其他国家隔着大海，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一点构成了它积极吸收外部文化的原因。”“由于隔着大海的地理环境，很少有被外部征服的担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文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是以武力威胁中国的地区。实际上中国自南北朝以来，以佛教为首的西域文化刺激中国文化发展是很大的，排除西域文化的流入来谈唐代的灿烂的文化也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中国人却长期没有考虑中国要学习外国文化。这就是日中两国在面临现代化时，在摄取欧美文化上产生差异的原因。”“如果说是或曾经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会成为摄取外国文化的严重障碍，那么，日本之所以能够积极地摄取外国文化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是由于它不是‘文化的发源地’、‘文化的中心地’。林层辰三郎在对谈《历史夜话》中说：‘日本人对外国人、外国文化本来就没有偏见。明治的文明开化的情况下是如此。不过，这种素质早从3世纪就有了，从那时就一直接触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比较自然地接受和学习了中国文化。’当然，事实上任何国家要发展文化都必须摄取外部的文化，日本也是不断地摄取其他文化，但也不断地形成具有日本个性的文化。不过，中国是古代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以后又以一贯的文化的连续性为其特征。它与具有经常摄取外国文化传统的日本之间，在摄取外国文化的技巧上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这是理所当然的。”旁观者清，局外人的评论也许能促使我们更清醒地回顾这一段历史，正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身份与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连续性，使古代中国形成极其强烈的“中国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把中国当成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礼仪之邦，而把域外的一切民族都视为“蛮貊”与“夷狄”，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

伶》第三)，孟子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中国的典籍中充斥着这类华夷之间地位不平等的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的言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对“蛮夷”慷慨赏赐而使之感恩戴德的故事，由他的随行人员用诗的形式记录在案：“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酋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三百年殖民主义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经对中国虎视眈眈，清廷统治者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君临天下，统驭万方，称“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清文献通考·四裔考》一）。凡外国使臣来华，均视为藩属贡使，是“仰慕天朝”的表现。因此，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访华，在承德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时就发生了觐见礼仪之争。马戛尔尼坚持行英国臣下觐见英王的礼节，即屈膝单腿跪礼，清廷则要求行中国臣子觐见皇帝的礼节，即三跪九叩首礼，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是：万树园宴会行英礼，正式庆典行三跪九叩首礼。此次英使访华历时204天，是中英两国首次通使，也是中西文化的首次直接正面碰撞。通使增进了相互了解，但英使提出的允许英商在珠山（今浙江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在北京开设洋行，在珠山、广州附近各指定一未设防的小岛供英商使用并可居住等项要求，乾隆皇帝则逐条驳斥，全部拒绝。拒绝侵占中国岛屿是维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确决策，但拒绝通商要求就失去了对外贸易的机会，拒绝通商的理由更是典型的“中国中心论”的代表作：“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蚕丝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敕谕又云：“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清政府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巨大变化毫无了解，还是一派天朝大国教训藩属的口气。

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遣以威廉·皮德·阿美士德为正使的使团访华。这次英使访华最难解决的还是觐见礼仪问题，使团于8月28日至29日夜里到达北京，嘉庆皇帝准备立即在宫中接见使臣及其随员时，英使却一反常态，正、副使臣已到宫门，均称有病不能参加觐见而使此次访华失败。嘉庆皇帝敕谕道：“朕以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可从矜恕，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此次尔等奉国王之命来天朝纳贡，不能成礼，即属尔等之咎。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

1792年英使觐见乾隆，在祝寿庆典上是否行了三跪九叩首礼，史家尚有争议。其实，英使行三跪九叩首礼，也只是例行公事，但在清廷官员眼中，就成为外夷敬畏天朝的伟绩，《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使臣马戛尔尼等觐见，自陈不习拜跪，乃至御前，而跽伏自若。”英使觐见乾隆皇帝的当事人之一，当年曾在军机处任章京之职的管世铭有题为《癸丑（乾隆五十八年）仲夏扈辟避暑山庄恭记》的诗：“献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仪野鹿腔。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诗后有注云：“西洋英吉利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充分表达了当时清廷官员认定天朝皇帝天威使外夷屈膝的虚骄自大思想。

1872年，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虽已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但清廷居高临下、虚骄自大的外交观念却并未改变。当年10月16日同治大婚，崇厚于大婚之前两日拜会各国公使，告之16日皇帝大婚，届时全城戒严，要求各公使和其侨民不得外出。按国际惯例，各国庆典均首先邀请外国大使参加，清廷不遵惯例，反而要求公使一律不许外出，各国公使都认为此举侵犯公使权益。1873年2月24日（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同治亲政，清廷仍不邀外国公使观礼，驻京各国公使遂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同治帝，祝贺亲政之喜，实际上是争取正常的国际礼仪待遇。于是就是否允准外使觐见同治帝及觐见礼仪问题又引起一场争执。3月11日，文祥赴俄使馆与俄、德、美、英、法五国公使商谈觐见礼仪，各国公使提出行免冠五鞠躬礼，文祥坚持行跪拜大礼，双方不欢而散。14日再次晤谈，仍各执己见。21日，总理衙门致函五国公使，强调觐见时须行跪拜大礼，五国公使不允，就此僵持不下。此时，朝臣亦议论纷纷，各抒己见。4月15日，编修吴大澂上奏，言祖宗之法不可破，不可允洋人觐见。4月24日，御史吴鸿恩上奏，言可允洋人觐见，但须开导洋人，中外国礼仪问题要互相让步。5月1日，李鸿章上奏，言各国使节要求觐见，应宽其小节，示以大度，不必就行跪拜礼一事纠缠不休。5月25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上奏，也言使臣觐见礼仪不必强人所难。28日，御史王昕上奏，主坚持行跪拜礼；御史边宝泉上奏，主不准觐见。按国际惯例，公使代表本国呈递国书觐见国王，双方地位平等，五国使臣允行免冠五鞠躬礼，已属尊重中国皇帝，清廷要求公使行跪拜之礼，实在是强加于人，不合国际惯例。经数月争执，清廷于6月14日正式下谕，允准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并拟订了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的程序和礼仪。6月29日，外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同治帝，并呈递国书。按预定程序，各公使均行免冠三鞠躬礼。一场觐见礼仪之争至此方告一段落。

18年后，又有觐见地点之争。同治及光绪朝均于紫光阁接见各国使臣，

1891年10月，德国使臣巴兰德向总理衙门提出，紫光阁为清廷筵宴藩属之地，各国使臣于此处觐见有视同藩属之嫌，请总理衙门代奏，另易他处觐见。别国使臣亦持此说。总理衙门再三辩驳无效后，奕劻等10月20日上奏，代陈各国使臣更改觐见处所之要求。清廷准其所请，改在文华殿接见各国使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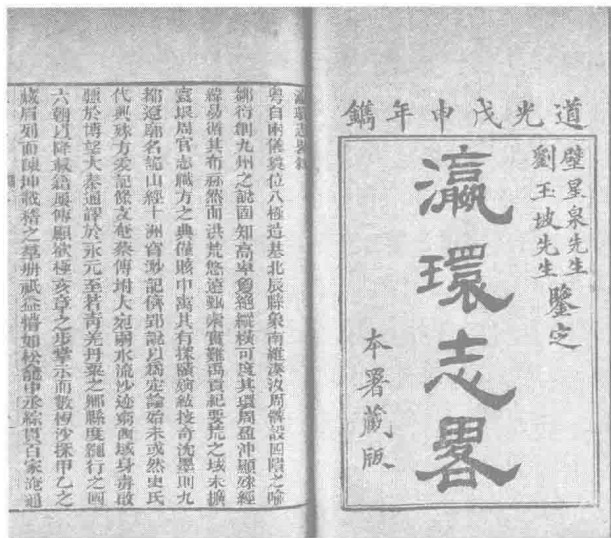
又过了十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各国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时，将公使觐见礼仪列为条约重要内容。1900年12月24日各国公使提出条约大纲十二条，第十二条即要求更改觐见礼仪。1901年8月26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议定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礼仪并录入条约附录中。觐见礼仪要点为：一、在乾清宫正殿觐见；二、各国使臣乘绿色轿加黄帟等。三、中国应派轿至使馆迎接，事毕送归，往返均派侍卫沿途护卫；四、使臣入宫走中门；五、使臣呈递国书，中国皇帝必须亲手接受；六、中国皇帝赐宴使臣，必在宫内并躬亲入座；七、一切仪节均以两国平等态度对之，以互不损伤国威为主。

1902年1月22日，光绪帝按《辛丑条约》规定的仪制在乾清宫接见德、英、法、俄、日、葡六国公使。1月28日，慈禧也按《辛丑条约》规定的仪制，在乾清宫觐见各国驻京公使。2月1日，慈禧又在坤宁宫接见慰问各国公使夫人。持续了几十年的觐见礼仪之争，至此终按各国要求而告一段落。觐见礼仪本应按国际公法办理，清廷要求公使行跪拜之礼，实在是强加于人。虽有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较早认识到这一点，但最终的转变却是在枪炮逼迫下实现的。

第三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早期器物层面的文化嬗变

马克思这样论述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华帝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一个帝国逐渐死去的过程是缓慢的，这个渐变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也经历了无数的波折。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官员与士大夫总结战败的原因，基本的立足点仍然是将西方列强视为南疆海国，把鸦片战争当作海疆问题来认识与反思，于是，巩固海防成为议论的焦点。战后短短的七八年间，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著述相继问世，这一现象，史家称之为“睁眼看世界”，中国人终于开始主动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早在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就组织人员翻译澳门出



版的报刊及外人著作，并于1841年根据译文又编辑成《四洲志》。1842年魏源在林则徐所赠《四洲志》资料的基础上，据历代史志并广罗西书，出版五十卷本《海国图志》，后经补充修改，1847年增订为六十卷本，1852年又扩编为一百卷本，是近代中国较早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

技、宗教和社会状况的著作，后来洋务运动时期推行洋务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出于此书。1848年福建巡抚徐继畲经五年努力，完成世界史地巨著《瀛寰志略》十卷，并附采用当时西方先进制图方法绘制的地图42幅。此外，还有梁廷楠撰《海国四说》、姚莹撰《康輶纪行》等。这些著作介绍世界各国概况，其主观目的并非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而是出于解决海防以抵御外侮的实用目的。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传播，导致本来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天文地理、工艺制作之类“夷之长技”逐渐成为学习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展了志在自强的洋务运动。以维持封建制度为前提的实用目标的实施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不是洋务运动推行者的意愿所能左右的，此后的中国社会客观上也就从器物层面上在中西文化交融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1861年1月，清廷设立旨在办理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门办理对外事务的机构，不久，又设立南洋、北洋通商事务大臣。1862年，开办京师同文馆，先后设立英、法、俄、德、东（日）文馆，招收八旗子弟学习语言以及天文、算学、物理、化学、万国公法等。培养各种语言的翻译人才。1863年，仿京师同文馆办法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同文馆，初设英文班，后又添设法文班、德文班。

1861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用土法制造子弹、火药、炸弹等，亦仿制轮船。安庆内军械所用土法制造洋器的实践虽不大成功，但毕竟是洋务派仿制西方船炮的开端，标志着手工制造向机器工业的过渡。其后至1872年